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七二）·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四〇期（zk1808d）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文献资料】	从机密档案看道县地区的文革的大屠杀	宋永毅
【春秋史笔】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冯 客
【往事非烟】	西安“七十三号”纪事	白 磊
【难忘岁月】	对话陈兼：一场难以忘却的“噩梦”	石剑南·徐婧娴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文献资料】

从机密档案看道县地区的文革的大屠杀
——《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档案（机密）》序

• 宋永毅 •

文革中发生在湖南省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事件，是中国大陆在此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的骇人听闻的惨案之一，但一直为官方所掩盖。所幸的是：中国大陆的作家和文革研究者谭合成先生穷近30年的锲而不舍的调查之力，终于在2010年由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省道县大屠杀纪实》一书。2016年，美国著名翻译家毛雪萍（Stacy Mosher）女士和郭建教授又把它译成英文，由久负盛名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欧美出版。至此，文革中惨绝人寰的道县大屠杀的真相才终于公诸于世，近万名地下的冤魂才有了真正安息的机会。

最近，我们又接到程鹤先生提供的有关道县及周边地区大屠杀的机密档案，就此编纂出版了这本《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档案（机密）》。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已经有了谭合成先生的纪实作品，为什么还要出版这样一本机密档案呢？在我看来，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特殊意义。其一，它们以中共自己出版的调查报告和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结论的形式，有力地印证了谭合成先生纪实作品的真实性。其二，这些机密文件中披露的大屠杀，并不囿于道县一个县，还波及到临近的零陵地区的其他十个县市。它们是祁阳县、东安县、双牌县、宁远县、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新田县、蓝山县、冷水滩市和永州市。其三，我们从中共文革后处理这些惨案的政策、方法中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些非常具有当代意义的问题。比如，文革中频发道县这样的惨剧，为什么中国大陆还有那么多的毛粉还要怀念文革？

◇ 道县大屠杀的密集度和源发性

在中国文革中发生的大屠杀中，道县的大屠杀虽然不是规模最大、死人最多的，但是它有其独特的密集度和源发性。尽管道县及其周边地区的大屠杀不是全省性的事件，因而在受

害者人数上比不上广西（死8·97—15万人）和内蒙（死1·7—4万人），但相对所占整个人口的百分比却是非常高的。道县的受害者总数，据本书中的机密文件《中共道县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的情况的总结报告》披露如下：

一九六七年我县发生了严重的杀人事件。当时全县十个区、一个镇和三十六个公社，都出现了杀人问题。519个农村大队，有468个队杀了人，占当时农村大队总数的90%。从八月十三日开始，至十月十七日的六十六天中，全县共死亡4509人，其中被杀4070人，被迫自杀439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的1·18%。被杀了的户数为2778户，占当时全县总户数的2·8%，其中全家惨遭杀绝的207户。……在死亡总人数中：男性3526人，女性983人，分别占总数的78·2%和21·8%；十三岁以下的386人，六十岁以上的324人，分别占总数的8·6%和7·2%；当时为四类分子的1977人，地富子女2145人，贫下中农和其他成分387人，分别占总数的43·8%、47·8%、8·6%。国家干部、教员、医务人员和职工202人，占总数的4·5%。还有中共党员九名、共青团员十八名也惨遭杀害。

杀人后遗属深受其害，其中有1509户遗属的7431间房屋被侵占、拆毁、变卖或损坏；有2423户遗属的39172件较大件的生产生活用具被查抄；有987名遗属被迫外逃（其中被迫随母下堂的282人）；有367人成为孤老孤残人员。在杀人期间，还有1202户，家里虽没被杀人，但房屋、财产遭到了查抄。

文革中的广西有人口2500万，即便按非正常死亡人数15万计算，也不过总人口的0·6%。文革中的内蒙古有人口1800万，即便按死亡人数4万计算。也只占总人口的0·2%。而道县的受害者人数竟然达到了总人口的1·18%，是它们的2—6倍，这在全中国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密度上是首屈一指的。更重要的是：道县的大屠杀还具有极大极快的传染性。据统计，“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全地区其余十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逼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含右派）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部分人因报复杀人而遇害），其它成分411人。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纵观文革中的大屠杀，大约有三种类型：1）武装平叛（或武装剿匪）式：军队对平民的直接杀戮，如青海军区1966年2月23日对占据了《青海日报》的818造反派的剿杀和1975年春昆明军区对沙甸回民的“平叛”；2）阶级灭绝式：由基层的武装部军人、党组织、基干民兵对所谓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杀，如北京1966年的8月的红色恐怖是其最早的源头；3）种族灭绝式：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如内蒙古借深挖“内人党”对成千上万蒙古族群众的残害便是典型。有时，这三种类型也出现混合。就源发性而论，道县的事件爆发的时间较早，在1967年8月。而广西、内蒙等地的大屠杀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规模地发生。此外，它不仅很快的影响了附近的十多个县市，还最早传染到毗邻的广西省，在大屠杀的方式方法和运作手段上都开了极坏的先河。

广西农村的大屠杀是直接受道县的事件的影响发生的，属阶级灭绝式的大屠杀，即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杀。当然也有军队直接动手的“武装剿匪”。在道县受害者比例中，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占了大约90%。在广西，因为1968年加入了对4·22一派的武装围剿，受害者便不限于四类分子及子女，但他们也占了60%左右。在大屠杀的特点上，广西和道县更有惊人的相似性。其一是大屠杀中施害者队伍的高度组织化和受害者群体的“被高度组织化”。据档案记载：广西大屠杀的“第一滴血”洒在桂林地区的全州、灌阳、平乐县和玉林地区的容县、平南、博白等县。因为受湖南道县等地屠杀四类分子的影响，那里都出

现了道县式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和“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等组织，使施害者高度组织化。同时，施害者们又通过荒唐的谣言和残忍的刑讯逼供等手段，把已经完全驯化了的四类分子“组织”进根本不存在的“黑风暗杀团”、“反共救国军”等反动组织中，为大屠杀制造出合理的借口。其二，两地的屠杀还常常都是“斩草除根”、灭门绝户式的，而蕴藏在这一残忍背后的常常是肮脏卑下的谋财害命的动因。其三，两地都发生了严重的性暴力，即杀父奸女、杀夫奸妻或为奸人妻（女）而杀人的现象。当然，两地大屠杀的传染性并非单方向的，而是互相的。在本书中收集的《中共东安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问题的调查报告》

（1967年3月3日）中就指出：该县在1967年受道县影响的杀人风中，“被杀的1人，自杀的10人。”受害者人数并不多。但是在1968年的“三查一清”运动中，受广西大抓所谓的“反共救国军”的影响，“1968年因抓所谓‘反共救国军’而引起被杀，自杀422人，其中被杀的139人，自杀的283人。422人中有四类分子95人，四类分子子弟137人，贫下中农164人，其他26人，共产党员10人，共青团员2人。被打伤、打残的1178人；被杀绝的16户19人；被迫外逃的161人；遗孀携带子女改嫁的34户87人；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的337人；房屋被非法强占，变卖、拆掉的96户181间，被查抄的财物价值20万5千元。”

和广西的大屠杀相比，道县的民众至少有一点还是幸运的。那就是驻湖南的47军在发现大屠杀后，很快就进行了阻止。根据本书中所附的《道县（36个乡镇）文革杀人事件、时间统计表（1967年8月13日—10月17日）》来看。道县的大屠杀始于8月13日，8月26—29日到达高潮，4天就滥杀了2181人。但是8月28日47军和湖南省革筹发现杀人事件，立刻电告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要求制止杀人。8月29日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武斗、制止杀人。滥杀的风潮就开始被遏制住了，死亡人数急剧下降。9月5日，零陵军分区转发湖南省革筹、47军关于制止杀人的电报。9月25日，47军和湖南省革筹联合发出紧急通告，制止杀人。继而，47军还动用了飞机散发传单，严禁杀人。到9月底，基本上就没有人被杀了。驻湖南的47军和省革筹之所以能在发现问题的半个月的时间内就制止住杀人狂潮，正说明即便在1967年8月全中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时，中共政权对局面的掌控还是没有失控。只要他们真的愿意，他们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制止武斗和制止杀人。当时的湖南47军的军长黎原和省革筹负责人华国锋都是真心想制止乱杀人的，他们就很快办到了。广西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广西军区和省革筹负责人韦国清等人是乱杀人的实际策划者和指挥者，杀人的风潮怎么可能被制止呢？因此，广西的杀人狂潮由杀人到吃人的恶性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必须指出，那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两地造反派和大屠杀的态度。1967年8月，毛泽东刚刚脱离7·20武汉事件“兵变”的阴影，对各地的地方军区、县武装部都持很不信任的态度，为各地被地方军区镇压的造反派坚决平反。同时，不少直属中央的野战军也被派往各地支左。道县被屠杀的那一派“革联”基本从属于湖南最大的造反派——湘江风雷，它曾被湖南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为湘江风雷正式平反。为此，“革联”当时被认为是“左派”、得到47军的坚决支持。这在湖南省革筹和47军的《联合紧急通告》中也可以看到，通告先要求“各县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必须迅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命令，立即全部收回上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所属部队。在保守组织手中的武器收缴后，掌握在革命造反组织中的武器亦应封存上交。”1967年10月8日，47军军长黎原在《接见湘南地区赴长控告团的重要指示》也特别指出：“部队去了以后，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支持革命造反派。坚决制止杀人事件……”和“革联”对立的“红联”，是一个保守组织，主要是它和道县的各级武装部军人、基层党组织和基于民兵制造了对阶级敌人的大屠杀。在他们眼里，四类分子是造反派的社会基础，大屠杀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四类分子和“革联”绑在一起，往他们脸上抹

黑。1967年8月15日，“红联”司令蒋文经等人杀害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钟佩英母子三人（所谓“反革命分子家属”），就是因为听说她支持和参加了湘江风雷。

广西的大屠杀主要发生在1968年4月以后，尤其是在毛中央的单方面的严厉谴责广西4·22造反派的“7·23布告”发布以后。自1967年到1968年，文革形势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毛和中央已经决定抛弃各地造反派，依靠军队和武力来尽快建立全国的“红色政权”。在这样的情势下，不仅四类分子作为抹黑造反派的牺牲品被害，即便是根正苗红的造反派成员，也被轻易地打成“反共救国军”等组织的成员被直接杀戮。广西大规模的人吃人的风潮被多次紧急并直接送入北京中南海，但从不见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此明确表态。由此可见，中共的所谓“政策”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为了一时一定的政治目的和需要，他的领导人既可以迅速地制止乱杀人，但也可以纵容和默许杀人甚至吃人。对于广西的大屠杀和人吃人的惨剧，尽管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下的命令，但他们绝对有制止不力、乃至纵容和默许之罪。

◇ 道县大屠杀中的造反派

一个问题会油然而生：既然保守派的干部群众都那么热衷于借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大屠杀来抹黑造反派，是否两者之间真有什么血缘的联系呢？答案是否定的。本书中所收集的几份机密档案恰恰告诉我们截然不同的结论。《中共祁阳县县委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1987年6月2日）中记载：该县对“阶级敌人”的屠杀是由掌权的湘江风雷的造反派发起的：“周塘公社组织委员造反派负责人任长勇（湘江风雷司令部的组织部长）等将逼供出来的假名单信以为真，通知到各个大队，造成了这个公社在67年9月22—23号两天内杀死了31人的事件。”另一份机密文件，《中共宁远县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1987年4月28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八月卅一日，水市区大界公社东瓜井大队杀人情况传到湾井区麦地公社路田大队，该大队‘湘江风雷’组织头头王洪林和贫协主席王财富为首召开造反派骨干会，大队干部会，组织策划。当晚杀三十八人。”类似的案例，《中共新田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1987年6月15日）记载的更为详细：

六七年九月九日，莲花公社大元冲大队文革副主任刘忠麒，邀集本村民兵十余人，前往县城观看城东公社杀人。刘得知杀人要经“湘江风雷”批准，便到了县“湘江风雷”司令部找到司令肖帮元，向他提出要杀刘宗煌等五人和借枪支一事。肖说：“这些人都要杀掉，不杀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你们借枪就到潭田铁厂找在那里集训民兵的‘湘江风雷’文攻武卫指挥部长雷玉荣商量。你去转告他，说司令部已批准，我可先打个电话给他。”下午四时，刘宗麒等人到潭田找到了雷玉荣，雷说：“情况肖司令已给我商谈了，要处决就明天。明早，我们全副武装去一个排。今晚一定要看守好，不要让他们跑掉，否则空去一场。”六点左右，刘又急速返回莲花公社，向公社文革主任刘明生（已故）作了汇报。刘明生说：“我通知全社将四类分子明早都捆来，给他们教训一下子。”随即，刘宗麒等人摸黑赶回大队，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传达了县、社请示情况。并部署杀人前的准备工作。九月十日九时许，将被杀人押赴莲花圩，这时，县“湘江风雷”二十多名全副武装人员乘车已到。戏台两边架有机枪，路口布置岗哨，戒备森严。群众大会由“湘江风雷”支队长刘大江主持，当场杀害三人。从九月十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这个公社有六个大队杀害二十八人。

文革中的四类分子和造反派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阶级敌人”，是为“公安六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1967年1月13日）完全所剥夺了参加运动资格的。而后者是“革命造反派”，是毛和中共在运动初期在党内权斗中的主要依靠对象。尽管造反派队伍中也有些多多少少有些“历

史问题”或出身不好的人，但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等同于四类分子。任何极权社会的主导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对阶级敌人，造反派的想法和保守派其实并没有不同，只不过他们在和保守派的斗争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在自顾不暇中常常无力去镇压传统的阶级敌人而已。而一旦他们处于强势的统治地位，他们也会对阶级敌人进行屠杀。上面在祁阳县、东安县和新田县发生的事，便是三个铁证。

道县的受害者主体——“黑五类”及子女在文革中和文革前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本书的机密档案告诉我们：他们作为饱受歧视贱民群体非但从来没有过任何“乱说乱动”，甚至已经被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到在临死前都不敢问一句：“为什么要杀我？”简言之，他们从来游离于任何派别斗争以外，都是百分之百的和平守法者。而且，受害者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十三岁以下的386人，六十岁以上的324人，分别占总数的8.6%和7.2%”。由此，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乃至妇女、老人和儿童的屠杀，无论在国际法、还是在中国自己的法律、甚至共产党的表面政策（如“黑五类”和子女的区别）中都不具有起码的合法性。长期以来，中国官场甚至学界中流行一种文革中“人人有错”的貌似有理的说法。但看这些机密文件，读者便会幡然醒悟：至少有一个数千万人的社会群体——“黑五类”——在文革中一点错误都没有犯过，他们是清白无辜的纯受害者。在我看来，如果说他们真的犯下什么错误的话，那就是面对祸从天降式的杀戮，没有奋起反抗、保卫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权利。

◇ 作为“第二次土改”的道县大屠杀

从本书的机密档案来看，道县的大屠杀和中共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照理，发生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的时间是1967年8月到10月，似乎与整个毛氏的农民运动史无关。但不无巧合的是：不仅事件发生的地点都是湖南，不少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执行者也都宣称他们的杀戮是对50年前毛泽东倡导的农民运动的模仿，并简称为“第二次土改”。据《中共道县县委关于道县一九六七年“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

（1987年11月30日）记载，道县第一个被杀的受害者是朱勉（国民党党员），曾被划为“反革命分子”。用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区公安特派员陈智希的话来说，杀他的理由之一是“这个土改杀脱了的人，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杀不了他。这次杀得好。”据谭合成的调查，自8月13日杀朱勉后滥觞的大屠杀，正起源于“第二次土改”、“土改补课”等等蛊惑人心的口号中。

鉴于这场大屠杀的组织者和执行者都曾认为他们是在进行“第二次土改”，这一文革惨案就带上了挥之不去的土改的阴影。如果读者进行一下更深入的调查和比较。便不难发现，道县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杀不过是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例如，道县发出杀人指令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其实不过是土改时期“人民法庭”的某种翻版。而施害者所采用的对受害者们先开“杀人现场会”斗争、再宣判，后用“刀杀”、“沉水”、“棍棒打死”、“活埋”、“火烧”等方法处死，完全是土改杀地主的全套流程。至于那些野蛮的私刑，也和土改中的暴力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还有：刽子手在杀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后，还常常公开引用他们集体无意识里深深积淀的“土改经验”。例如，加害于受害者之前，凶手们常常先逼迫他们的“浮财”——有的甚至是第一次土改时埋藏的“光洋”。并欺骗他们：这是“土改政策”，交出你的钱来，便可以买下你的命。而在杀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后，凶手们一定不会忘了土改的传统——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财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就是暴徒们再也无法从受害者那里分得土地。因为第一次土改中他们分得的土地，早已经被中共在一两年后以“农业集体化”的名义收归了国有。

这样，本书机密档案中的血泪记载，就提供给了读者这样一个十分简单却令人信服的反推逻辑：如果说毛氏农民运动在它滥觞半个世纪后的文革（和平时期）中都还造成如此无法无天、恐怖残暴的惨案，那么在它发源的战争时期和成型的“暴力土改”的建国初期，还会有什么基本的人性和正义可言？

在纪实作品《血的神话》中，谭合成曾针对每一个血案进一步深入调查了这些受害者到底有什么劣迹，为什么会在建国初期的第一次土改中被划分为“地主富农”。调查的结果是：如果不贴上阶级的标签，这些人非但没有“黄世仁”、“南霸天”式的臆造出来的罪恶，相反都是清白勤劳、遵纪守法的好人。他们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的财产达到了农村中中产阶级的水准！如同谭合成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化时所言：“随着历史真相不断浮出水面，特别是随着对道县文革杀人事件采访的逐步深入，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历了唐山大地震般的震撼’，不能不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什么是那些被血腥的真相解构的“金科玉律”呢？无疑是毛泽东的农民运动的革命神话。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读者，都会在读完这些机密档案后认识到共产革命的非正义性和非人性，认识到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神话与生俱来的嗜血性。

◇ 宽大无边的处遗政策和毛泽东热

对道县及其周边地区的杀人凶手，文革中和文革后共有过两次刑事处理。第一次是1968年到1974年，道县县委县革委对12名证据确凿、群众反映强烈的挟嫌报复杀害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强奸、轮奸后杀人的犯罪分子，分别判处了5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但由于当时对整个杀人事件的官方定性是：“道县及其周围一些县市出现的‘乱杀风’是阶级斗争激烈化的必然结果，广大贫下中农在少数地富分子组织反革命组织，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阴谋暴动的情况下，为保卫红色政权，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动采取行动，杀了一些四类分子，也误杀了一些无辜者，虽然有过激化和扩大化的错误，但贫下中农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除上述12人外，其余因类似问题关押审查的对象都作了平反处理。为首组织、策划、指挥杀人者基本没有触及。可谓宽大无边。

第二次是1984年6月处遗工作正式开始后，通过一千多名工作组成员深入细致的工作，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摸清。调查结果表明，整个零陵地区被杀的九千多人中，无一人有过任何形式的反革命言行；当时全地区破获的数十个“反革命组织”（道县7个），都系假案。全地区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组织策划杀人、督促指挥杀人和杀人凶手）的责任人有15050人，其中道县7281人。怎样处理这个庞大的杀人事件责任人队伍，收录在本书的《中共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文化大革命”中杀人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1985年3月28日）作为指导性的文件，提出了“以大局为重，着眼于长远，以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遵循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指导思想，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具体地说，“凡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挟嫌报复杀人者；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后杀人或以夺人妻、女为目的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者；在支左部队或上级明确提出制止杀人后，仍然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对其中那些能够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又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罪行，认罪态度好的，可从轻判处。凡属需要逮捕法办的，批捕权归地区。对杀人从犯和奉命组织指挥杀人、奉命充当杀人凶手者，只要能够认罪认错，一般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在这样的宽大政策下，其结果是全零陵地区只逮捕了124人。道县人民法院于1985年底到1986年初，分别对蒋文经、苑礼甫、郑有志等42名杀人事件重大责任人开庭审理，判处无期徒刑1人，十一至十五年有期徒刑7人，八至十年15人，四至七年12人，三年2人。24名原国家干部

中，判得最重的是苑礼甫，13年；判得最轻的是曾庆松，3年。详见本书第三部分的附表《道县文革农村杀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干部基本情况表》。

另外，整个道县有948人受到党政纪处分，占杀人事件责任人总数的13%，其中631名党员，开除党籍449人，整党中免登181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1人。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402名脱产干部中，给予党政纪处分的209人，占52%：其中开除党籍108人，免登2人，取预1人，撤销行政职务、降级和记过处分98人。杀人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后被吸收入党的114人，开除党籍96人，免登10人，取预1人。道县民间流传的“三条人命一个党籍”，所言不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杀人偿命”的公理，即便在最黑暗的封建王朝中亦然。文革后广西的处遗工作中，最后还是枪毙了十名情节恶劣的杀人犯和强奸犯，而对同样的道县大屠杀的处遗工作，竟然一人不杀！实在是太宽无边了。

然而，这样的宽无边度的政策是否使罪犯真心诚意地认罪伏法了呢？结果恰恰相反。本书中收录的《湖南省道县收到错误追究处分的全体人员为纠错平反、落实政策向党中央的请示》（2000年6月5日）是那些杀人犯对这一政策的反馈：鸣冤叫屈，坚决不认罪。还把私刑杀人的责任推到所谓的四类分子身上，还振振有词第认为是“群众自发起来与四类分子的现行破坏作斗争”的正义之举。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仍然有一批忠于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的“毛派”。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谭合成的调查和本书的机密档案都告诉我们：至少道县大屠杀的施害者们便是这些“毛派”中的一部分。1984年4、5月——在毛泽东逝世8年以后，新的中共领导人决定派遣工作组到道县调查这一震惊中外的血案。但是，“工作组一进场，立即被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的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有的说：‘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说话？’有的不吃不睡，拼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来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这一反常的现象却又向读者们提供了一个简单而令人信服的逻辑：如果中国大陆不痛批毛泽东，继而彻底解构毛泽东热的理论和社会基础，那么再来第二次文革、重演道县惨案决不是一种耸人听闻的盛世危言。

我想：这也正是我们五十年后出版这本机密档案的初衷和目的所在。

□ 来源：《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档案（机密）》，程鹤、宋永毅编，2017年由纽约明镜集团的国史出版社作为电子书出版。此序原载2017年第四期《明镜月刊》，为作者向《华夏文摘》提供。

~~~~~

## 【春秋史笔】

### 毛泽东与个人崇拜

• 冯 客 (Frank Dikotter) •

“个人崇拜”这个词出现得比较晚，最早使用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用它来批判昔日的领袖斯大林。不过，斯大林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纵容别人吹捧自己的独裁者。有人认为，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是墨索里尼。1922年，他在法西斯军队的帮助下夺取政权，随后在罗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墨索里尼政权有一些鲜明的特征，如领袖站在阳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行古罗马式的军礼、身穿黑衫的追随者、黑色的旗帜以及盛大的阅兵仪式等等，这些特征其实早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成形了。掌权之后，他的党羽不断歌颂他天纵英明，而墨索里尼本人也俨然以真命天子自况，高居所有同僚之上，似乎他永远

正确，并将率领“法西斯新人”实现意大利的伟大复兴。他的照片、画像和半身塑像随处可见，那颗光光的脑袋令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 一、形象与权力相伴相生

希特勒也学墨索里尼的这一套，上台前竭力煽动民众，许下种种承诺，一朝掌权即尽食前言。他将自己装扮成天降伟人和救世主，似乎比拿破仑还要厉害，要替德国一洗《凡尔赛条约》的历史耻辱。他重建了德国的军队，也重新激发了国民的自豪感，因此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在纽伦堡的一次次集会上，受到万众欢呼。在当时德国人的心目中，他并非热衷于夸夸其谈、激情四射的演说家，而更像一位真诚谦逊、值得信赖的政治家，得到男女老幼的由衷爱戴。希特勒的这一形象通过无数载体得以广泛传播，如照片、明信片、画像、半身塑像、人偶玩具（许多人偶的右臂可以举起行纳粹军礼）等等，甚至闹钟——就像后来中国出现的画有毛泽东像的闹钟一样。有些大公司专门建有小教堂，里面供着希特勒的半身塑像。全国各地涌现了数百个以希特勒命名的街道和广场，就连只有一百多人的小村庄也不例外。

斯大林同样鼓励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从1929年开始，苏联每年都要在红场举行几次盛大的阅兵仪式，每次他都站在列宁墓的顶上，接受民众的欢呼。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二战后达到了顶峰，他命人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十几种语言，畅销国内外。苏联境内随处可见斯大林的半身塑像和全身像，他的画像同马克思、列宁一起，悬挂在所有学校、机关和工厂里，许多村镇和城市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斯大林比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活得都长，也更善于因时制宜，操控人们对他的崇拜，他偶尔也会发表指示，要求对他的歌颂降降温。

当然，所有领导人（包括民主选举出来的）都会刻意营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例如在拍摄官方照片时摆个特别的姿势之类。有些国家领导人在生前也会得到人们的颂扬，如华盛顿、拿破仑、戴高乐和里根等。但20世纪出现的个人崇拜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对伟大人物的崇敬。在民主政治时代，权力不再由神授予，而来源于人民，独裁者运用个人崇拜的手段，无需通过选举，便可制造出一副万众拥戴的假象。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即现代的独裁者们也不得不依靠民众的支持来维持自己的政权。赤裸裸的强权虽然可以通过军事政变或操纵选票等方式得逞于一时，但并不能长期有效。正如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描述纳粹政权时所说，利诱和威逼是当权者惯常使用的两种伎俩。我们也可以说，对独裁者而言，形象与权力时常是相伴相生的。

除了制造万民拥戴的氛围外，个人崇拜还有其他一些功能。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因为政治上的高压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因此独裁者往往被谎言所包围，无法确切了解每个人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个人崇拜则可解决这一难题，它迫使每个人都公开歌颂领袖，人人都说谎，真假莫辨，致使反对独裁统治的人们很难组织起来发动政变。一旦个人崇拜全面展开，局面就会不受人人为的控制，逐渐摧毁每个人的尊严，将人人都变成溜须拍马者。人们不仅对自己的言论进行自我审查，而且谁要是歌颂领袖时显得缺乏热情，就会遭到周围人的责难。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不例外。作为斯大林的忠实学生，毛应该很早就认识到个人形象的重要性。他在还未加入共产党的学生时代，就曾读过德国哲学家鲍尔森（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A System of Ethics）一书，并作了大量阅读笔记。在这本书的空白处，他写下了日后将贯穿其一生的重要原则：“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



然而，若非得到莫斯科的许可，对毛的个人崇拜也无法建立起来。在1949年之前的数十年里，苏联人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经济资助和理论指导。1935年，斯大林日益担心日本或德国会进攻苏联，因此改变了之前的外交路线，鼓励各国共产党与所在国的当权派由对抗转为合作，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就必须提高共产党领导人的威望。共产国际为此宣布，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之一。得到莫斯科认可后的第二年，毛便利用来自美国密苏里州、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记者斯诺，为自己虚构了一个生平。1937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出版，将毛介绍给了全世界的读者。这本书是件完美的宣传品，它将毛描绘成“精通古文、博览群书、酷爱哲学与历史、善于演说、记忆超群、专心致志、文笔优美、不拘小节、工作细致、精力旺盛、深谙军事与政治的天才”。与此同时，斯大林也以行动来支持毛。1938年，他让《真理报》称赞毛是“聪明的战术家”和“杰出的理论家”。几个月后，毛便利用苏联人对他的赞誉，趁机重写了中共历史，将自己塑造成用正确的路线团结全党，并率领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领袖人物。

抗战期间，毛待在安全的大后方——延安。他利用这一时机进一步抬高了自己的威望，将自己宣传为中国的救星、先知和导师。同时，他对政治对手们进行了无情的清洗，所有党员都被迫没没了地作自我检讨，并歌颂领袖的英明伟大。1943年，有人访问延安后报告说：“到处都能见到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和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两年后，“毛泽东思想”被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1949年后，对毛的个人崇拜开始日益盛行。当红旗飘扬在北京上空时，一幅匆匆赶就的毛泽东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随后，毛主席的画像出现在学校、工厂和机关里，而且画像悬挂的方法还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像莫斯科一样，北京每年都要举行几次精心编排的阅兵仪式，整齐划一的士兵、大队的骑兵和坦克、装甲车等一一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高高在上的毛主席检阅。《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革命歌曲也开始流行开来。

毛利用自己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袖地位，指导全党向苏联学习，缔造了一个严酷的政权。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作为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毛热衷于集体农业、对领袖的无限崇拜、消灭私有财产、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实行全面控制，以及巨额的国防开支。

虽然毛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但他们二人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毛在许多方面都对他的这位导师心存芥蒂。1950年，斯大林在莫斯科就曾羞辱过毛，他故意把毛晾在一边，让他等了几个星期才举行正式会谈。斯大林担心中国强大起来后，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因此想竭力遏止中国学习苏联的步伐，例如他缩减了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资助，并告诫北京不要过快实行集体化经济。

1953年斯大林死后，毛终于解放了，中国经济集体化的步伐也加快了。1953年底，中央实行了粮食的统购统销，迫使农民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将粮食卖给政府。1955至1956年开始出现类似于苏联集体农庄的合作社。合作社将分给农民的土地拿过来，把村民们改造成完全听命于国家的农奴。在城市里，工商业全部实行国有化，所有私营经济——无论小店铺还是大企业——全都收归国有。然而，为了加快集体化进程而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却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1956年，毛的集体化突击运动遭遇了一次重大的挫败。这一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严厉批判了斯大林生前的种种恶行，如发动残酷的大清洗、驱逐大批异见人士、未经审判即处死犯人等等，并同时批评了集体农庄制度。周恩来和

其他中共领导人抓住这一时机，暂缓了集体化的进程。在9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大上——这次会议主要是选举自1945年以来的新一届中央委员，无人再提及“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口号，所有涉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都从党章中删除，个人崇拜也受到一致谴责。毛的内心虽然心潮起伏，却也别无选择，只好默认。

面对去斯大林化的大势，毛的反应似乎是站在人民一边，捍卫自由表达的民主权利，提出党应该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给了毛一个重掌局面的机会。1956年11月，苏联军队镇压了布达佩斯的抗议，毛谴责匈牙利共产党未能倾听人民的不满，致使事态不断恶化，最终失去了控制。他因此呼吁民众说出心中的不满，帮助党的干部改进工作，以纠正种种不公的社会现象。就像日后在文革中的情形一样，毛首先利用学生和工人来贯彻他的指示。很快，批评的声音就爆发出来了，但内容却完全出乎毛的预料。毛本希望听到一片赞扬之声，那些积极分子本当体察他的用意，批评那些将毛边缘化、将“毛泽东思想”从党章里删除的人。可事实上，人们开始喊出要求民主和人权的口号，有人甚至要共产党下台。民众的不满如此强烈，令毛颇感震惊，他让邓小平负责，发动了一场针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将至少55万人打成了反党的“右派份子”。

毛的计划虽然失策了，但这场运动至少让他和老战友们重新团结了起来，开始联手压制批评党的声音。毛趁机重操大权，并着手加快农村的集体化改造。1957年11月，他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领袖们应邀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毛表面上表示效忠赫鲁晓夫，并尊称他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但内心深处认定只有自己才有资格享有这一地位。早在斯大林生前，毛就认为自己的革命意志更为坚定，因为毕竟是他而不是斯大林领导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取得了解放，而且在朝鲜战争中跟帝国主义阵营打了个平手。在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在肉、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上赶上美国，毛也大胆宣布中国将在15年内赶上英国——英国那时还是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大跃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大跃进是毛第一次企图盖过苏联风头的尝试。农村中的男女老少都被赶进了人民公社，组成一支人数庞大的劳动大军，没日没夜地从事生产，毛认为这样就可以加速赶超中国的竞争对手。毛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他将率领人类建造一个物质富饶的新世界。

毛还利用大跃进重新发起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当时由郭沫若、周扬联名主编的大跃进“新民歌”选《红旗歌谣》中，头一首就是由基层的文人冒名“民歌”写的颂诗：“毛泽东，/毛泽东，/插秧的雨，/三伏的风，/不落的红太阳，/行船的顺帆风。/要想永世不受穷，/永远跟着毛泽东！”1958年初，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迫使政治对手们向他臣服。他反问道：“崇拜有甚么不好？”“我们相信真理，对掌握了真理的人就应该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毛解释说，这些都属“正确的个人崇拜”。毛的追随者立即闻风而动。上海市长柯庆施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刘少奇则可怜兮兮地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其他党的高级领导人也纷纷表态，一边作自我批评，一边歌颂毛的伟大。

毛要求别人对他必须绝对忠诚，只有效忠他的人才能得势，因此人人都拍他马屁。结果，所有决定都得服从主席的好恶，而很少考虑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1959年夏，大跃

进显然已经造成了灾难，但即便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交的那封措辞温和的批评信，也被毛视为向他背后捅刀子。彭被指控为“反党集团”的头子，罢免了职务，而林彪却站了出来，坚决捍卫毛主席。他厉声叫喊：“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刘少奇也对毛大肆奉承，将他同马克思、列宁相提并论。刘说：“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全国上下，任何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的人都会受到追究，大约有360万党员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或“小彭德怀”遭到清洗。取而代之的都是些心狠手辣的人，他们根据北京的风向随时调整自己的立场，以期从中获益，并利用一切手段从农村中攫取粮食。结果，大跃进并未能促进中国的经济赶超苏联，却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数千万人任由驱使、遭到殴打，乃至饿死。

1962年1月是毛的光芒最为暗淡的时期，大约七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们一起开会，讨论大跃进失败的问题。小道消息称，许多人批评毛轻信谎言、不懂数学，主席的位置岌岌可危。有些高级领导人甚至认为，毛应该为众多老百姓的死亡负责。毛的权威受到了全面质疑。他害怕自己死后也落得斯大林似的下场，有人会像赫鲁晓夫一样批判他。那么，谁将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呢？

从1962年8月开始，毛发起了反击，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缘起。他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旨在教育农民，要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消灭在大跃进高潮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行为。同时，这一运动也是为了教育作为革命接班人的年轻一代。林彪开始大力鼓吹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因为在庐山会议上积极批彭德怀得到嘉奖，被任命为新的国防部长。1964年，军队发放了数百万册《毛主席语录》，也就是所谓的“红宝书”。毛对这样的奉承很受用，他命令全国都效法林彪和人民解放军的这一做法。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军队还参与制造了更为军事化的氛围。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强调要培养儿童的阶级仇恨，并开始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数年里，年轻人就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认为身边确实存在着阶级敌人。

1966年夏，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领袖。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崭新的文化，而不再是经济改革——因为上一次尝试就是大跃进，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毛一定很好奇，赫鲁晓夫为甚么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就轻而易举地扭转了苏联的内政外交——他不仅在1956年抨击斯大林，两年后又提出要与帝国主义阵营“和平共处”。答案是：苏联在文化领域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了，但资产阶级的文化依然势力强大，因此只要少数人手握大权，就可以侵蚀并推翻整个制度。

列宁发动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榜样。但现在，像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份子篡党夺权后，却将苏联重又带回到资本主义复辟的老路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其目的就是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打倒修正主义。共产主义的希望就在中国，毛主席将指导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他继承并捍卫了马列主义，并将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创立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与他相比，斯大林根本不值一提——这就是毛的宏大构想。

与此同时，毛发动文革也是为了消灭他想象中的，以及真实存在的敌人。十年前的百花齐放运动中，他允许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结果却事与愿违。1966年夏，他发动学生打倒

老师，严查他们的历史，将所有仍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都赶尽杀绝。那年8月，在他的允许下，狂热的红卫兵开始攻击党内的高级领导，以确保没有人能够联合起来反对毛主席。毛还鼓动学生攻击一切所谓“封、资、修”的文化，红卫兵因此向旧世界宣战，四处施暴、焚烧书籍、砸毁墓地、破坏寺庙和教堂，对一切象征过去的东西大加批判，甚至连街名和招牌也不放过。他们还到各处抄家，仅上海一地就有约25万户被抄，家中保存下来的旧东西——无论是普通书籍，还是贵重的古玩字画——全被洗劫一空。

## 二、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崇拜毛主席

在批判旧文化的同时，毛宣称要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所谓的“新文化”就是对毛主席的崇拜。最简单的崇拜方式就是喊标语口号。有亲历者说：“过去也有许多标语口号，但现在的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每一面干净的墙面都必须认真地刷上毛主席语录或者尊敬他的话。”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等等。商店、工厂和学校全都挂起了这类标语，有些从楼顶上一直披挂下来。公交车、卡车、轿车、面包车等各类汽车的车身上也都刷上了毛语录。

在这个红通通的新世界里，人的所有感官都受到轮番轰炸。马路边搭起了临时讲台，红卫兵站在上面尖声高叫，向路人发表激情昂扬的演说，不时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呼吁人们积极投身革命。在天上，国内航班的空中乘务员也向旅客们发放与《毛主席语录》相关的读物。最让人胆战心惊的则是高音喇叭。这个东西很早就被运用到宣传运动中，但如今它们一天开到晚，而且音量开到最大，反复播诵《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还在警察执勤的交通岗亭里念语录，声音则通过扩音器传到大街上。城市里到处都是游行的革命青年，他们高唱着革命歌曲，歌颂毛主席和他的思想。广播里也放着同样的歌曲，并用高音喇叭传送到农村、学校、工厂和机关。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叫《大海航行靠舵手》，另一首则叫《毛泽东思想放光芒》。

在对领袖的崇拜中，人人都唯恐落后。愈来愈多的事物被划入“封资修”的范畴，老百姓只能买一些不会出“政治问题”的商品，其中最泛滥的当然是毛的相片、像章、宣传画和书籍。为了生产这些个人崇拜的物品，工厂不得不开足马力。上海新建了七家工厂，占地16,400平方米，大约有三个足球场大，专门用来生产这些商品。在江苏，许多任务厂经过重新改造，专门印刷“红宝书”。生产红墨水的工厂也加班加点工作，但仍然供不应求。

“红宝书”的封面是鲜艳的大红色。至1968年，单是用来生产这种封面的塑料就用掉了四千多吨。早在1966年8月，商业部就开始禁止生产塑料鞋、塑料拖鞋和塑料玩具——全国的工厂都要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做贡献。

计划经济苦苦挣扎，但仍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例如，光是毛主席像章，1968年每个月就生产了五千多万个，但仍不够用，由此促生了地下黑市，与官方竞争。有些政府机构为自己的员工订制了像章，但在利益的驱使下，也半公开地对外出售。此外还出现了地下工厂，专门为黑市生产像章。它们与国营工厂抢夺稀有资源，不仅偷窃铝桶、水壶、锅和盆，甚至把工厂里涂在贵重机器外面的铝制保护层刮下来用作生产像章。

像章的款式数以千计，材质包括有机玻璃、塑料、竹子等，有些是手工着色的瓷像章，大多数则是铝制的，上面用金色或银色画着毛主席的侧面像，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左半边脸。像“红宝书”一样，佩戴像章成为表达对毛主席忠诚的一个标志，而且要戴在正对心口的地方。在文革初期的几年里，毛主席像章成了最热门的私人物品，被用于交换或买卖，各种资

本主义的投机手段都出现了。因为生产像章占用了太多的铝原料，以致影响了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1969年毛终于发话说：“还我飞机。”这样一来，生产像章的热潮才开始降温，1971年林彪死后则基本停止了。

在文革的第一个阶段，普通老百姓、干部和军官们出于对文革的不同理解，产生了意见的分歧，形成不同的派系，大家都坚称自己代表了毛主席的真实意图，各个派系之间甚至出现了恶性的武斗，整个国家陷入了一场内战。很快，人们就开始用机枪、高射炮等武器在大街上打起来。但不管怎样，毛主席始终是胜利者：他审时度势，随时更改计划，令数百万人沦为牺牲品；他不时介入斗争，拯救忠诚于他的追随者，或者把昔日的同僚投入狼群；他可以宣布任何一个派系是“反革命”，也可以随时收回成命；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无数人的命运，也能导致无休止的暴力，而人们却始终争相证明对他的忠心。

1967年夏，暴力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毛不得不出面干预。他前往各地巡视，呼吁实现“大联合”。10月1日，北京召开了一次盛大的集会，以展示“大团结”的局面。五十万士兵列队走过天安门广场，队伍的最前面则是一尊高大的毛主席白色塑像，挥手指向前方。士兵身后是由数十万群众组成的方阵，许多人虽然并不乐意，但也不得不跟对立派系的成员并肩而行。

全国各地都涌现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解放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了，如今军队试图用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来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纪律。林彪说：个人崇拜将有利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968年3月，中央发动了一场“三忠于、四无限”的运动，要求所有人绝对忠诚于毛主席以及他的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对毛的崇拜推向新的高潮。学校、机关和工厂都得供奉毛主席像，通常还会用红纸剪出“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几个大字，成弧形贴在毛像的上方，有些毛像的头部还发出一道道光芒。大家每天得向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

有人甚至发明了“忠字舞”。这种舞蹈动作简单，主要是将双臂从胸口伸向毛主席像，伴舞的音乐则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歌颂毛的歌曲。电视上整晚都会播放这些仪式性的歌舞节目，通常在舞台中央摆放一尊巨大的毛主席半身像，身后则用灯光打出一道道闪动的光线，好像是从神像的头部发出来似的。

毛的塑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上海一地就多达六十多万个。大多数是用灰白色的石膏做的，还有钢筋混凝土的、铝的和马口铁的。有些塑像高达十五米，庄严地矗立在人们的头顶上，有些则只有三米高。为了建造这些塑像，各地展开了非正式的竞赛，耗费了许多稀有资源。1968年，仅上海一地，光是马口铁就消耗了九百吨，钢铁厂则花了十万元生产不锈钢，用来支撑这些塑像。

1968年夏，文革的第一个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党和政府的权力。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军官，实权都掌握在军队手里。在这之后的三年里，全国都被军队控制了，士兵们监管着学校、工厂和机关。军队还发动了一系列清洗，在1966至1967年的文革高潮期间敢于直言的人都受到了惩罚。最初，当局将数百万不受欢迎的人（包括学生和其他听从毛主席话的人）送往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随后，全国开始抓“间谍”、“特务”和“叛徒”，成立了各种特别委员会，调查普通民众和党员与所谓“敌人”的联系。接下来的一场反腐运动令全体民众进一步臣服于毛的统治之下，一言一行稍有不慎——如不小心在毛主席的画像上抠了一个洞，或者质疑计划经济等，都可能遭致刑罚。许多人靠揭发同事、朋友、邻居和亲人，来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绝对忠诚。一场又一场的清洗冷酷无情，令人防不胜防，社会彻底分裂，人与人互不信任，对强权只有服从，只能

效忠于毛主席一个人。对此不顺从的人都要被迫接受改造：普通人不得不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干部则被关进“五七干校”。

1969年4月，中共九大通过新的党章，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国的指导思想。毛主席终于推翻了1956年9月党的八大所做的决议。

然而，此时毛对军队已经心生警觉，特别是对林彪——正是他在军队中首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毛利用林彪发动和维持了文革，但林却借机扩张个人势力，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军队的各个重要岗位。1971年9月，林彪死于一次神秘的坠机事件。军队对社会的控制随之终止，军队本身也遭到了清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里，毛继续操控着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开始降温，因为这一崇拜是与林彪和军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却渐渐与美国走得近了。1972年，全国各大城市装扮一新，准备迎接尼克逊访华。北京的反美宣传画都取了下来，反美的声势也低调了许多。上海的市容整顿一新，当局组织一群妇女，将和平饭店对面墙上高达三米的标语“不可战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刷掉，代之以“世界人民大团结”。原先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的毛像以及其他数千尊毛主席塑像全被移走，悄悄送往石膏厂销毁。

毛主席本人也精心打扮了一番。他同尼克逊的会面是一次重大的宣传盛典，这条消息震惊了世界，标志着冷战的天秤倾向了美国一边。毛在北京洋洋自得地说：美国人正处在从猴子变人的进化过程中，但“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他把尼克逊——这个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贬低为前来天朝进贡的使节。随后不久，欧洲、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各国领导人也纷纷前往北京，争取中国的认可。

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下场不同，几年后毛是在自己的床上去世的。与斯大林也不同，他死后并未受到批判。斯大林的尸体由赫鲁晓夫下令从红场的陵墓中迁走了，但直到今天，毛的尸体依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里。他的画像仍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并印在每一张人民币上。今天，很少有人再去读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更不要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但仍有人信奉毛泽东思想，甚至连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也不例外。很多地方都能见到印有毛像的汗衫。在革命伟人的行列里，毛受欢迎的程度轻易就超过了他的唯一竞争对手——切·格瓦拉；在利用个人崇拜将自己捧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与马克思和列宁齐名这方面，毛超越了从斯大林到金日成的所有对手。然而，中国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个人崇拜把党员都变成了马屁精，任由领袖驱使，造成数千万普通民众的无辜死亡。通过执行毛的指示，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成了他所犯罪行的同谋者，并因此不得不一代一代继续维护毛的正面形象。

□ 原载《中外学者谈文革》，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

【往事非烟】

西安“七十三号”纪事

• 白 磊 •

“七十三号”，是指位于西安市东门内建国路的七十三号院，民国时为高桂滋将军公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当时张、杨二将军为了蒋介石的安全，需要寻找一处幽静又舒适的住处。西安事变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迁送到张学良公馆旁边的这座高桂滋公馆。蒋介石在此住了11天。

1949年西安解放后，高桂滋将军把这座公馆作价15亿人民币（旧币）捐了一架战斗机，随后搬往另处居住。建国路七十三号院先后成为西北妇联和中苏友协等机关团体的办公处，1956年，省政府把成立不久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即现在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安排于此办公居住。

◇ “七十三号”成为“军事监护所”

1967年，陕西文革造反组织派别间的纷争如火如荼，无论是造反较早的以西安交大为首的东派，还是以干部子弟居多的西军电、西工大为主的西派，都在以革命的名义进一步深入夺权。西安各红卫兵组织已经不满足于揪斗陕西的“走资派”，决心再抓名气更大、地位更高的“走资派”。1月4日，西北大学一派红卫兵组织奔赴洛阳矿山机械厂，将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揪回西安，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则与西安戏曲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联手，赴北京全国人大，将原陕西省省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赵伯平揪回西安。随后周恩来即指示陕西省军区，将习仲勋、赵伯平交由部队军事监护看管，送至建国路七十三号。

1967年3月14日，根据中央的指示，陕西省军区以监护的名义，在西安市建国路七十三号原作协陕西分会院内，成立了军事监护管理所，将国务院原副总理习仲勋、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赵伯平、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陕西省省长李启明等6人监护管理，并规定看管以后其行动应由省军区批准，革命群众组织需要批斗时可由省军区负责送到批斗会场，批斗完再带回来。凡各地要通过习仲勋、刘澜涛、赵伯平、王林调查有关人员材料时，应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通过赵守一、李启明、刘庚调查材料时，应由省委组织部专案组批准。1968年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这个军事监护管理所由省革委会政法组和省专案办公室负责。全称为“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监护管理所”，对内称“建国路七十三号”。

从此，“七十三号”这个名字成为文革中陕西老干部难忘的梦魇。

时任二十一军军长、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炜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七十三号”问题时，是这样说的：文革期间，当时中央对领导干部的历史问题及在什么线上的人物问题看得比较重，中央成立3个专案办公室，审查这方面的问题。文革开始后，中央即指示陕西省军区把一些西北局和（陕西）省的领导同志监护起来，在中央关于抓所谓叛徒的通知影响下，西北局、省、市机关和大专院校的群众组织，从各方面搞了许多领导同志的材料，说这些同志是什么叛徒、特务或有叛、特嫌疑。省革委会成立后，群众组织把一大堆材料送交省革委会处理。1968年10月，省（革委会）领导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根据政法组的建议，确定对一些同志进行监护审查，联通中央指定监护的共32人，同时确定由4家部队（即21军、陕西省军区、总后西安办事处、兰州军区空军）抽调干部并吸收两级机关和大专院校参加过调查收集材料的少数同志，组成专案办公室，21军保卫处副处长徐正宗同志任办公室主任，由省军区副司令、省革委会常委兼政法组组长黄传龙同志负责组织领导专案审查工作。（胡炜著《征程纪事续集》第53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版）

而1979年陕西省委印发的《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称，自1967年3月至1975年4月，省革委会在建国路七十三号办了一个“监护管理所”，实际上是个监狱，凡关进去的，都当敌我矛盾处理。这里先后关进去55人，其中西北局部长以上3人，省委书记、省人委副省长以上干部28人，省级副厅长以上、西安市委书记、市人委副市长以上干部24人——戎子和（西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被关7年又7个月；赵守一（陕西省委第二书记）、李启明（陕西省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伯平（陕西省原省长，文革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林（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经委主任）被关都在6年以上。

先后被关的干部还有：习仲勋（国务院原副总理兼秘书长）；高克林（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王甫（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韩劲草（西北局秘书长）；严克伦（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白治民（西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组织部部长）；杨植霖（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李登瀛（西北局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刚（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方仲如（中央监委驻西北监察组组长）；舒同（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张策（陕西省委书记处原书记、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文革前调中央党校学习）；章泽（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常黎夫（西北局统战部部长）；陈元方（陕西省委秘书长）；刘文蔚（陕西省总工会主席）；杨宗耀（陕西省人委参事室副主任）；罗明（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陈煦（西北局副秘书长、调研室主任）；侯永（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副主任）；刘子久（原劳动部副部长，文革前任西北局研究室研究员）；傅子和（陕西省委常委、副省长）；刘庚（西安市原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前被批判撤职下放劳动）；刘邦显（陕西省副省长）；林茵如（陕西省副省长、省人委秘书长）；张毅忱（西北局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甘一飞（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原党委书记，文革前任十三冶党委副书记）；白瑞生（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李骥德（陕西省人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省委副秘书长）；李宁（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启明之妻）；高步林（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万士杰（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马志超（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张之轩（西北局办公厅副主任、政法组组长）；李万春（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颜志敏（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光远（西安市副市长）；宋孟邻（西安市副市长）；张言博（西安市副市长）；张锋伯（西安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杨晓初（西安市副市长）；崔一民（西安市副市长）；薛焰（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张国声（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刘颖（省人委办公厅李启明秘书）；秦仲方（陕西省副省长）；尚寅宾（陕西省公安厅厅长）；叶迈（身份职务不详）。

由此可见，当时“七十三号”关押审查的干部并非胡炜所说的32人，而应该是55人。

◇ 法西斯的“监护”

我外公白瑞生，文革前任陕西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运动初期即被扣上“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黑干将”“三反分子”的罪名，后来又整理出他“宣扬传播原省委一小撮走资派所贩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货”、“包庇、干扰破坏习仲勋反党集团案件的清查”和“整理毛主席黑材料案”及“特嫌”的问题，被关进“七十三号”，实行所谓的“军事监护，隔离审查”。

外公晚年，我问起他被关押在“七十三号”的情形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在里面精神压力很大、吃不饱、晚上睡觉不许关灯，一举一动皆有军人监视。再多就不讲了，也许是他血液里流淌的严格党性，也许是他不愿意过多提及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而他在晚年一篇回忆赵伯平的文章中提到“七十三号”的情景，则讲得更详细些。他写道：

“这里实际上是一所监狱。凡关进去的人都被当作敌我矛盾，完全限制自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每个人都编了代号，单独关押，叫号不呼姓名。一个小院里关押的人，每天早晚放风两次，其他时间大小便都在自己的囚室里（放一个便盆，待放风时自己端出去清洗）。小院与小院之间严格管理，不准被关者互相碰面，同院的人不准互相说话，夜晚睡觉通宵开灯照明，以便看守人员监视。有时灯泡坏了，就不准再睡在床上，要站在门口监管人员能看到的地方，直到换好灯泡为止。前来外调、谈话叫提审，有专门的提审单和审讯室（设在地下室）。不准家属探望，不准通信自由，还随便搜身，任意打、骂、体罚。伙食标准低，管理差，普遍吃不饱，饿肚子，有人浮肿。就连饮用的开水，早上给打的多半是蒸馍锅水，水色淡黄，带苦涩味。

“在关押我们的这个小院里，遭受打、骂、体罚最多的就是赵伯平同志，还有张策、戎子和同志。我多次看到赵老被罚站在院子当中，热天晒太阳，冬天受冷冻。虽遭多次折磨，但赵老仍坚强不屈，总是斥责监管人员违背党的政策、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在一次罚站中，不知因为什么他和看守人员发生争执，被看守人员打耳光。一个青年竟动手打一个银发白须的革命老前辈，残酷之状惨不忍睹。张策同志也被罚站过，也被打过，是拉到小院外边殴打的，我们只听见张策同志的呼喊声：打人了，打人了！在一次搬砖的时候，别人一次只能拿六七块砖，监管人员却叫戎子和同志抱十多块。戎当时也是年近古稀之人，抱不起来，一个看守人员就在他身上猛踢一脚，戎便跌倒在砖堆上，在场的人无不愤恨不平。”

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王林，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我的革命历程》中专门有一章《铁窗生涯》，记录了他在“七十三号”被军事监护的情景：在个人的房间里，“安装了一盏四十瓦的灯泡，夜里睡觉也不许关掉”，“看押我的军人向我宣布了纪律：睡觉时必须脸朝外，不许脸朝里”。伙食则是“过道里放着一个大筐箩，旁边放着一个大铝盆，盆里盛着菜，一个军人发窝窝头，一个军人用长把小铁勺给众人舀菜”。在“七十三号”被军事监护期间，伙食定量为“早晨一个窝头一勺菜，中午两个窝头一勺菜”。王林还写道：“我自从来被西北工业大学造反派管制后，从没吃过好饭，肚子总是觉得饿，没想到这里的伙食比西北工业大学还要差，领到的这点食物真是吃不饱啊！吃下去，不一会儿就饿了。”“有一次我奉命去厨房帮厨，厨师让我帮忙择菜，劳动了一上午，感觉很饿了，我看见剥完的大葱很水灵，灶台上又放着甜面酱，我拿了一根大葱想蘸点酱吃，结果被旁边的人发现一把将大葱抢过去，扔在地上。然后他训斥我说：这大葱是给你吃的吗？快走吧。当时我的感想是，一个人如果连果腹的食物都得不到保证，还有什么尊严可言。”（《我的革命历程》第190页、第19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对于在“七十三号”内的饥饿，林牧回忆：“由于我们的伙食标准低，每天只有4角钱，而管理人员又在贪污克扣粮、油、煤炭，我们受监管的人普遍吃不饱，六十几岁的人也吃不饱，面汤、米汤都很珍贵，都要抢着打，到院外劳动，捡到菜根和西瓜皮如获至宝，拿回囚室里洗净了慢慢吃。有一天，我和一个囚徒给伙房抬菜，抬到伙房，对炊事员说：给我们一点生菜吧。炊事员害怕监管我们的公安战士看见，就急急忙忙抽出几棵生葱给我们藏在衣兜里，我回囚室吃葱，却越吃越饿，从此，我才懂得葱是开胃的，以后要生菜不要葱了。”“我还有一种解决饥饿的办法，就是吃猪食。我是猪倌，在喂猪时，监押的公安战士嫌猪圈臭，站在很远的地方，我趁此机会，捞起猪食槽的菜根菜叶和馒头、米饭渣子，大口大口地与猪争食，同时还要抓几把发酵饲料藏在裤兜里，晚上假装读毛选，抓起裤兜里的发酵饲料，小口小口地吃下去。军管组发现了，又批判我偷吃猪饲料，暴露了丑恶的灵魂。其实，那些逼得人不如猪、与猪争食的法西斯分子的灵魂，才是极端狠毒和丑恶的。”（林牧著《烛尽梦犹虚》第216页至第219页，新世纪出版社）

1979年5月13日陕西省委审干办公室和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写的《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早在1968年5月9日，时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炜就在省革委会全委会会议上说：“要加强专案工作，西北局部长一级，省委常委及副省长以上，市的副市长以上，分别由西北局、省、市搞，按专案对象建立调查组。”“对赵（守一）、李（启明）等等，一个组负责一个对象，负责与此对象有联系的一小撮。”同年5月16日，时任陕西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的张虎在省革委会领导干部会上说：“走资派、专政对象都比较嚣张，专案进展不快，翻供、反动标语、黑信、黑电话都比较多。最近××、××的老婆搞活动。”胡炜当即下令：“对这些必须军管、监管的搞个材料。”同年12月20日，胡炜在专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说：“专案工作是擒王的工作”，“陕西敌情严重，中央首长多次讲了。现在揭发的敌情，还是点上的，还没有串成线、连成面。”11月27日讨论专案工作时，胡炜讲，对李启明下面的人“要查，干这些事，不止李一个人”。“要把这一伙子搞出来。”1972年8月24日讨论专案工作时，胡炜说：“陈元方（一九三六年入党，党组织就破坏，是否与陈有关？”

1968年10月18日，在省革委会的碰头会上，李瑞山说：“政法组要找个地方，把副市长、副省长以上当权派集中起来，搞清问题，和黑帮不一样，但也是半军管，不叫军管，就是集中管理。”省革委会政法组根据指示起草了一份报告，提出要监管的西北局、陕西省委、省人委领导干部名单，李瑞山批示：“经讨论同意此名单，一部分性质明显的军事看管，一部分监护。要抓紧叫他们交代自己的问题并揭发别人。”同年12月20日，李瑞山又在专案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说：“搞专案就是对敌斗争。”文革结束后李瑞山在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讨中提到此事，他说：我在思想上接受当时一些文件上关于文化大革命前西北局、陕西省委是所谓“黑线”“反革命老巢”等错误观点，对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的问题，形成错误看法，多次错误地点名批判彭德怀、习仲勋、赵守一、李启明、刘澜涛等领导同志。尤为严重的是，1968年10月，经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决定，把西北局、省、市委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进行所谓监护审查。当时，虽然有把这些干部保护起来，免被乱揪乱斗的想法，但在实际监护过程中，事与愿违，把这些同志当成敌人对待，采取法西斯手段，使这些同志的身体、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这都是极为严重的错误。尽管当时我对具体情况不清楚，但我要负主要责任。

“九一三事件”后，“七十三号”陆续将一些被监护审查的老干部释放，相继下放到五七干校、农场和工厂，实行继续审查和监督劳动。专案组审查人员又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将这些老干部“上连下挂”，进行迫害。1974年“批林批孔”时，他们在这些老干部中大搞“反右倾”“反回潮”“反翻案”，1975年又搞定性升级，一次就补定了8个所谓的“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翻来覆去，揪住不放，总要将这些人打倒、搞臭、整死。文革前任陕西省人委参事室副主任的杨宗耀，在“七十三号”被关押了两年之后，又转入监狱，1973年4月冤死狱中；文革前任陕西省总工会主席的刘文蔚，在出了“七十三号”后又被下放外县，文革前任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的罗明，从“七十三号”出来后被“双开”回乡，均含冤去世。

◇ 历史的结论

十年文革期间，陕西省是重灾区，当时的陕西被污称是“胡宗南、国民党的反革命老巢”“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苦心经营的反革命政变据点”“土改、镇反不彻底”“敌情严重”“有一股右倾复辟势力”“陕西地下党严重不纯”“是第二国民党”等等。文革中在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想影响下，全省立案审查的脱产干部达68024人，占全省脱产干部总数的17.4%，其中省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同级干部总数的90%，厅、局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0%以上。在审查干部时，不少

地方出现了由群众组织任意审查干部，由个人决定干部处理，调查取证采取各取所需、断章取义、东拼西凑、添枝加叶等手段，更为严重的是有的违反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治，随意关押干部，大搞逼、供、信，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新中国成立后四届省委常委中大多数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死党”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省级机关59%的部、厅、局级领导干部被打成“阶级敌人”；全省1350名干部被拘留，其中县处级干部110人，在《陕西日报》《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的社论煽动下，政法机关被诬蔑为“进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反革命政变的重要工具”，以致全省200多个公检法机关被捣毁，大批干部被揪斗、审查，有的地方甚至还采用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等手段，捕风捉影，屈打成招，制造了400多起“集团性反革命”案件，涉及干部6050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陕西省开始全面纠正文革的错误，大规模地开展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1979年5月13日，陕西省委印发《关于“七十三号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被关入‘七十三号’的所有老干部，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个叛徒、特务、反革命。”“省委决定，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7月号

~~~~~  
【难忘岁月】

对话陈兼：一场难以忘却的“噩梦”

• 石剑南 • 徐婧娴 •

◇ 前言

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亲历者、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具有强烈“中国情结”的美国公民，陈兼教授对于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而拨开众多耀眼的光环，陈兼教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平易近人的人。在2018年春季学期，陈兼教授在上海纽约大学教授两门课，分别为20th-Century East Asia-U. S. Relations（20世纪的东亚—美国关系）和Reading and Viewing Modern China（解读现代中国）。他因“书院讲学”式的独特教学风格和渊博的学识在学生中广受好评。怀着敬佩感与好奇心，围炉·上纽有幸邀请到了陈兼教授，与石剑南、徐婧娴两位同学对话，来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中国历史、中美关系和当下广受关注的时事的见解。

W：看到您的经历里，说您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您介意谈一谈文革吗？

C：当然可以谈，也应该谈。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但从我这样的亲历者来看，这是一场难以忘却的“噩梦”，是一段极为真切的生命时光。而到头来，从幸存者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种不可复制的人生炼历。当一切都成为过往时，我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再回过头去检视、思索那段时光时，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想法、感受。文革是不可复制的。同学们没有在毛的时代生活过，也许体会不到，而我们可真的是在毛的时代长大的。毛主席讲出的很多话，我们当时真的是相信的。而这种状况是回不去、不可复制的。

就毛主席他自己讲，他本人是有“猴气”和“虎气”的。他是搞政治的头号高手，同时还有构建宏大叙述的非凡能力。他说过很多极富鼓动性的话，比如“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又比如“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里发展起来的”，诸如此类。而对于这些话，我们当时真的是相信的。那时候人人崇敬毛主席，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1966年到北京的时候，有过两次见毛主席的机会。有一次是我们排在长安街两旁，那时候我特别矮，在后排站着。毛主席的敞篷车过来的时候，前排的人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第二次是下午两点多进天安门广场的，本来我们是排成纵队走，不能够串行的。可那时没有人管得住我们，我就钻到金水桥边。在那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是那种全场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所有的女孩子都嚎啕大哭的情绪。那种感情绝对不是假的。

文革当中有很多复杂的现象。你比如说红卫兵运动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最早的红卫兵都是红后代，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但是到了一月革命之后，我们在上海中学自己组织红卫兵，分成好多派，都在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

W：这些红卫兵都是学生吗？那么文革又是怎么能够做起来呢？

C：都是学生，几乎没有老师。当时，青年教师和十四五岁的我们平起平坐。我们当时读书，主要读毛的书。文革之所以能够做起来，其实有很多因素。我从历史的角度来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毛有巨大的感召力，而且他的那种巨大感召力，那种构建“继续革命”大叙事并让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年青人接受的能力，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无与伦比。而且，他的论据不是从外面抄来的，他善于运用中国历史文化的事例来说事，

比如说，他关于“一大二公”的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想象，就常用历史事例来论证。说明一大二公思想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古已有之，借助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比如他讲到过三国时的张鲁“五斗米教”，以及“置义舍”“置义米肉”“不置长吏”的举措，等等。他还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却做不到，我们要做到。这些都是他读史书得来的。他那种乌托邦想象，在今天想起来一方面让人心悸，但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一方面，人们经历了大跃进那种大失败，大饥荒，自己挨饿的状况自己清清楚楚地知道。就连红薯都不够吃的那种年代过去后，不过几年间，居然就搞起了文革，而且还能够如此具有煽动性，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合法性呢？我想，能让别人跟你心悦诚服地一起走，就是合法性。你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逼着他，这不是合法性。诱之以利，从而让别人跟你走，这是极为肤浅也靠不住的合法性，一旦利益没有了，合法性也就没有了。毛的时代，人们是在饿着肚子之后还能跟着他走，这是一种奇特的“合法性”。

W：那我可不可以说，是毛主席他本人就有这样一种感召力？

C：一个是他的感召力，但更基本的是他构建继续革命“合法性”宏大叙事的能力。新中国立国时，毛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后来看，这其实是一句巨大的合法性声明，也是毛一生中说过的重要的话之一。当时，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可后来想起，他就是通过这样的宣示，把中国人的“受害者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改造为爱国主义。文革发动时，他说“反修防修”，但他同时又大讲“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时，他在感召群众时加入了维护民族与国家利益的内容。

W：那么文革对您触动较大的地方，或者说对您的影响有什么？

C: 到了1967, 68年全国大乱, 工宣队进学校里来了。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人是多么粗俗, 在女同学面前也是满嘴脏话。那时我们就开始有“非分之想”了。我们那时在上海中学, 做过今天想起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帮同学把文革中的各种异端文字收集起来, 编了两大本的《思潮集》。读的时候, 一方面感到, 怎么很多地方与我们那么有共鸣, 但另一方面, 又有一种负罪感——我怎么在读这些反动文字?

那时候, 一方面我们在说“革命方知主席亲”, 可再另一方面, 我们又感觉同毛开始疏远了, 但我们不敢直接讲出来。而我是那个环境下开始大读“野书”的。1968, 1969年起, 我大量读书, 甚至曾经把内部出版, 威廉·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整本几乎抄了下来, 这是一本很厚的书。文革结束我被平反以后, 立即就参加了高考, 考取了华东师大。本科读了一年, 老师就推荐我提前去考研了。而我考研正好考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际关系史。得益于当年的抄书经历, 我的分数特高, 连后来的导师都啧啧称叹。

那个年头, 书店没人管也没人读书, 而我就把书从书店挪到家里, 很多都是六十年代出版的马列图书。我们很多人当时还在读的另一本书, 是马迪厄写的《法国革命史》。很多年后才知道, 这本书不仅我们这一帮人在那里读, 以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朱学勤等也在读。

W: 看来文革对您这一代人都是有影响的吧?

C: 当然有影响。我们这一代人, 基本上都是有过文革炼历的。文革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它把我们这些人全部赶出课堂, 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在学校里“闹革命”。当然也有很多逍遥派。文革的发生不仅仅在学校, 它还在工厂, 机关。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城市都搞遍了, 但是农村相对来说触及面没有那么普及。虽然我们无法估计文革的社会影响, 但是我觉得文革造就了我们这一代, 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感。这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革情结”。

W: 您之后出国与这个有关系吗, 或者说您为什么选择出国去读博?

C: 我是第一批被平反的, 1977年底参加高考, 有幸被录取。后来, 我一年多读本科, 三年研究生, 又派到西藏民族学院去支藏半年, 然后回到华东师大教书三年半。

我当时是做世界史, 中外关系史的, 而我在华东师大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二战前1937—1941年美国对德政策的研究。写那篇论文, 一方面有我文革时期阅读的大量书籍做“底子”, 另一方面也是机缘。正巧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华东师大承担了一个关于二次大战起源的国家级重点项目, 其中有一条就是做资料功夫。我从那时候, 包括毕业之后, 就在上海图书馆大量地阅读各种外文的文献集。我那时候没法看原始的文字档案, 我就一本本读上图收藏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英国对外政策文件集》, 《法国白皮书》, 等等。

我做硕士论文时用了很多这种资料加上那时看得到的二手外文资料。在当时, 像这样做世界史几乎很少的。我的那篇文章先是被《历史研究》在1983年接受发表, 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了。可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1984年这篇文章居然评上了《历史研究》优秀论文奖。这个评奖我完全不知道, 它是全国读者、专家投票产生的, 我没有任何门路。结果当时选出15篇, 4篇世界史, 11篇中国史。世界史的4篇中, 另外三篇是罗荣渠、刘祚昌、马克尧这几位国内顶尖历史学家的文章。而我当时才三十出头, 他们居然把我这一篇选上了。那时, 也就是我出国前, 在国内也小有名气, 不知天高地厚地参加好多会议, 国内也有好多机会。

但是我发现有一条，我是搞中外关系史的，而我如果不出国，就不能与国际前沿研究接轨。可当时学校和国内有关部门都把我列为重要培养对象，不放我出去。1986年那年，我和他们软磨硬磨，终于有一个机会能有一个大学为我提供博士全奖。我也没管那其实是个二、三流大学，抓紧机会就出去了。

〔作者介绍：陈兼教授，现任上海纽约大学暨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体系历史学杰出讲座教授，以及美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学者，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特聘访问教授。著有《中国通往朝鲜战争之路》（1994）、《21世纪的中国挑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启示》（1997）、《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2001）等多部佳作，受邀参与写作《剑桥冷战史》、《剑桥国际共产主义史》、《剑桥印度支那战争史》等。他的相关研究，被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引用三十余次。2005年，因参与制作《解密：尼克松在中国》一片，他荣享最佳文献纪录片艾美奖。目前，陈教授正在撰写完成《周恩来和他的时代》一书。〕

□ 来源：微信号《围炉》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